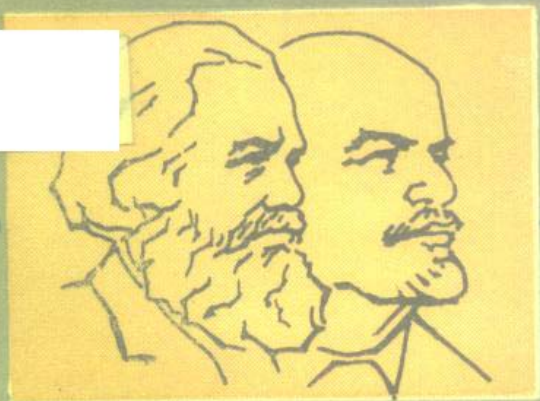




#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 对马克思主义的运用与探索

河南大学出版社

#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 对马克思主义的运用与探索

编委主任 马任平

编委副主任 舒新辅

王 晓

编委会委员 孙尚俭

陈桂兰

侯远长

河南大学出版社

GDA34/19

#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对马克思主义的运用和探索

中共河南省委理论工作领导小组

责任编辑 王进国

---

河南大学出版社出版

(开封市明伦街85号)

河南省新华书店发行

河南省兰考县印刷厂印刷

---

开本: 787×1092毫米 1/32 印张: 8.25 字数: 181千字

1988年10月第1版 1988年10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3000

定价: 2.30元

---

ISBN7-81018-187-4/D·13

## 前 言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在中国大地上奏起了以改革为主旋律的新乐章。以改革统揽全局，使我国在短短几年内面貌为之一新，无论是农村还是城市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开辟了社会主义建设的新阶段。

改革是一场伟大的革命，又是一场伟大的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为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理论奠定了深厚的基础，推动了理论的发展。以科学的态度，回顾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走过的历程，总结经验和教训，使马克思主义理论在实践中得到坚持和发展，是全党面临的一个重大课题，也是历史赋予我们的神圣职责。伟大的实践需要伟大的理论。为此，去年夏天，我们举办了“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党对马克思主义的运用和发展”研习班，并邀请了国内一些著名学者高放、陶德麟、于祖尧等到会讲学。他们分别从哲学、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等方面深刻探讨了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党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运用和新发展，其中有不少独到的见解和精辟的论述。这对于从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加深对社会主义的再认识，加深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解与认识，加深对改革的理解与认识，增强对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的理解提供了有益的启示和帮助。根据来自全国各地与会同志们的要求，我们将几位

学者的发言编辑成书。党的十三大召开之后，我们又组织作者对原稿作了部分的补充和修改，现奉献给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十周年。

中共河南省委理论工作领导小组

1988年5月

## 目 录

|                                   |          |
|-----------------------------------|----------|
| 改革需要哲学，哲学需要改革·····                | 陶德麟（1）   |
| 毛泽东哲学思想新发展·····                   | 雍 涛（27）  |
| 新时期领导哲学研究·····                    | 石 训（54）  |
| 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不可逆转之势·····              | 于祖尧（78）  |
| 列宁的合作制理论在中国的发展·····               | 杨承训（103） |
| 论对当代西方经济学的评价问题·····               | 杨德明（127） |
| 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制·····                 | 高 放（148） |
|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党对科学社会主义<br>的新发展·····  | 高 放（169） |
|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                  | 郑建邦（213） |
| 邓小平关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br>的基本思想····· | 张怀宇（232） |
| 后记·····                           | （258）    |

# 改革需要哲学，哲学需要改革

陶德麟

## 一、改革需要哲学

我们这个拥有十多亿人口的东方社会主义大国，正在进行一场举世瞩目的改革。在这场改革中，马克思主义哲学处在什么地位？能起什么作用？改革需不需要马克思主义哲学？这个问题乍看起来似乎不成其问题。马克思主义哲学是我们党的世界观，是我们党制定纲领、路线、方针、政策的理论基础，而今天的改革是党领导的，谁会说改革不需要马克思主义哲学呢？但是，事情并不那么简单。如果我们回避事实，就应该说这个问题在我们大多数干部和群众中并没有真正解决。在许多人心目中，改革需要自然科学、技术科学、管理科学，需要政法财经方面的社会科学，需要文学艺术等等，这都是没有问题的。但是是否需要哲学呢？人们就不一定从内心里承认了。哲学这门学科，连同搞哲学的人，似乎都有点受冷遇、受歧视的味道。有的人一提起哲学就往往把它同夸夸其谈的空洞说教、不着边际的高谈阔论联系起来，认为这是不能解决任何实际问题的无用之学，投以鄙夷的目光。面对这种情况，我们这些搞哲学的人应该怎么看？怎么对待？我看第一是不要视而不见，采取不承认主义。第二是

不要因为别人触犯了我们的职业尊严而义愤填膺，给人家扣上“轻视党的理论基础”的帽子。第三是不要自惭形秽，也跟着说哲学确实不行。正确的态度应该是冷静地客观地分析一下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然后考虑怎样对待。

为什么会出现哲学受轻视的情况呢？原因当然很多。但我看最主要的原因有两条：一条是长时间的“左”的错误败坏了哲学的名声，另一条是很多干部群众对哲学的性质和功能缺乏正确的理解。

#### 先说第一点。

我们党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的一段相当长的时期里犯了错误，主要是“左”的错误，包括“文革”这样的大错误。人民吃了苦，国家受了难。过去党犯错误的时候，哲学在干什么呢？它在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纠正党的指导思想上的错误吗？没有。恰恰相反，它是在为错误作论证，作辩护。比如1958年的“大跃进”、“人民公社”，明明把生产力破坏得一踏糊涂，连饭都没有吃的了，我们的哲学还要出来论证这是“必然趋势”，还要为“人有多大胆，地有多高产”、在“不怕做不到，只怕想不到”、“不怕想不到，只怕不敢想”这样的主观唯心主义、唯意志论大唱赞歌。明明瞎指挥把大家害苦了，还要去写文章论证“外行领导内行”是“普遍规律”，似乎人民受够了苦难还得从“理论”上心悦诚服地认识到受苦受难的必要性和优越性。不仅如此，甚至两个完全相反的东西，哲学也都能出来提供“理论”依据，“证明”它们都是“马克思主义的”。我不是说所有的哲学工作者都是如此。确有一些水平很高、又具有坚定立场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是能够在惊涛骇浪中看准方向，坚持实事求是。



是的原则，不随波逐流的。但这样的哲学家毕竟是凤毛麟角，而且几乎没有一个不受打击的，有的还献出了生命。至于大多数搞哲学的人就难免要为错作辩护了。这有种种不同的情况。个别的人是毫无原则，见风使舵，搞投机的。多数人认识问题，以为这样做是听党的话，听毛主席的话，这些同志长期在阶级斗争为纲和个人崇拜的熏陶下，分不清是非，以为这样做就是在为党工作，在尽理论工作的职责。有的同志也并不是完全没有觉察到这样做的不对，并不是没有怀疑，但是在那种“大气候”下面也只好说些违心的话。悲哀就在这里！不管具体情况有什么差别，有一个事实大家是看得清清楚楚的：这些年来使许多人民吃了大苦，使民族遭了大难的错事、蠢事、坏事几乎全是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名义发生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经常为那些歪曲基本事实和损害人民利益的事情唱赞歌、作辩护，而且翻手为云，覆手为雨，无实事求是之意，说不上有什么科学性。人们讨厌那些使自己受苦受难的“左”的错误，也就讨厌为错误作辩护甚至推波助澜的所谓“马克思主义哲学”，这是毫不奇怪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情况基本改变了，哲学的作用也改变了。比如真理标准的讨论就为拨乱反正开了路，为人民立了大功。可是人们对哲学在过去“左”风盛行时的那段不光彩的历史记忆犹新，一时还改变不了老印象，这也是很自然的。我想，这是直到今天还有不少人讨厌哲学、鄙视哲学的一个重要原因。

当然，人们对哲学的这种看法毕竟是不对的，因为人民大众受难之日，也正是马克思哲学遭到歪曲、践踏之时。那个时期的重大方针政策的错误之所以发生，固然与我们缺乏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有关，但是更根本的原因还是我们在许

多方面和许多问题上背离了以实事求是为核心的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说到底就是背离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原理。我们回想一下，那个时期报刊上、讲台上、书本上宣传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究竟有几条是符合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呢？实在是谈不上！比如神化领袖的作用，鼓吹质变在任何情况下都“优”于量变，鼓吹生产关系决定生产力，上层建筑决定经济基础，把精神的作用夸大到不受物质条件制约的程度，把哲学对具体科学（特别是自然科学）的指导作用歪曲成为替代作用，把辩证法的丰富内容简单化为一个“丰”字，如此等等，能说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吗？当年用来为错误的方针政策作论证的，不正是这样的所谓“马克思主义哲学”吗？所以，为错误的方针政策推波助澜给人民带来灾难的决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而是贴着“马克思主义哲学”标签、冒充“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反马克思主义观点，是一些与马克思主义南辕北辙的混乱荒谬的观点。如果我们今天把罪责归到马克思主义哲学头上，那就实在是歪曲马克思主义哲学，造成冤案了。我们不能因为上过假药的当，就连真药也一起骂。

#### 再说第二点。

我们有相当多的干部和群众对哲学这门学问的性质和功能是不大清楚的。哲学是一门什么性质的学科？它能起什么作用，不能起什么作用？在许多人的观念里还相当糊涂。这也与过去的某些错误的宣传有关。过去有些宣传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威力”说的神乎其神，似乎它既是囊括一切具体知识的超级知识库，又是能够直接解决一切具体问题的万能金钥匙，似乎一个人只要“精通”了马克思主义哲学，“掌

握”了它的原理，不需要去学习和掌握专门的知识技能，就可以直接解决任何具体问题，既会打仗，又会筑桥，既会修理电视机，又会搞成本会计。这当然是非常荒谬的理解。可是不少人实际上就是这样理解的，或者是接近于这种理解的。他们既然把哲学理解为“万能”的学问，也就要求它发挥“万能”的作用。可是很快他们就发现哲学并不“万能”。不仅不“万能”，而且似乎连“一能”也没有——它不能象具体的专门知识技能那样解决任何一个具体问题。比如说，一位写了很多书的哲学教授如果不去学习补鞋的专门技术，单凭他那一套哲学原理是连一双鞋也补不好的。这的确是事实。于是哲学在这些人的心目中就从九天之上一下子跌落到九地之下了：“哲学有什么用？还不如补鞋的技术有用！讲得天花乱坠，落实起来一个问题也解决不了，空谈而已！”“不能带来效益的学问有什么用？哲学能带来什么效益？一条对立统一规律能使我这个工厂的产值提高多少？”应该说，这种看法也是哲学受到轻视的一个原因。

对哲学的这种看法当然是一种极大的误解。

哲学这门学问在性质上是与分门别类的自然科学、社会科学、技术科学不同的。那些具体的科学揭示的是各个特殊领域里的特殊的规律，提供的是解决各个特殊领域中的具体问题的方法。所以你学会了某一门具体科学，你就能用它来解决那个特殊领域里的具体问题。比如你学了会计学，你就会记帐；学了建筑学，你就会设计房子。这“用处”是非常显然的（其实这也是大大简化了的说法，实际上即使是具体科学，要成功地运用到实践中去解决具体问题，也还要通过若干中间环节，很难说是“直接”解决具体问题，不过需要

经过的中间环节比哲学需要的少得多罢了)。哲学就不同，它揭示的是整个世界万事万物之间最普遍的关系，提供的是解决一切领域中一切具体问题的最一般的原则和方法，这就是我们通常讲的世界观、方法论。它不可能告诉你记帐的技术、设计房子的技术或者别的什么技术。它的性质决定了它没有这种功能，我们也不应该要求它有这种功能。那么能不能因为它没有这种功能，就说它没有用处呢？不能这样说。要知道哲学虽然不能直接解决某个具体问题，但是解决任何具体问题都离不开它，只不过许多人没有意识到、没有理解到这一点就是了。一个没有学过哲学、自以为与哲学毫无关系的人，或者对哲学充满了不屑一顾的鄙夷之情的人，其实都有自己的哲学观点，他的思想和行动都受着他自己的哲学观点的支配。如果一个人的哲学观点非常谬误或者非常混乱，那么他就很可能在观察问题处理问题的时候犯总体性的长期的错误。在小事上可能聪明绝顶，在大事上却往往糊涂不堪。个人如此，群体也如此。如果掌握了象马克思主义哲学这样科学的哲学，情况就会截然不同，由于它为你提供了一个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你就会有大的问题上有一个正确的方向，正确的路子，有了错误也容易纠正得多。这就是哲学的功能，哲学的用处。哲学的这种特有的功能和用处，是任何别的科学都代替不了的。我想只举两个大家熟知的例子就足够说明问题了。

第一个是我们国家民主革命时期的例子。我们党从成立一直到遵义会议这么多年，一方面领导全国人民进行英勇的斗争，取得很大胜利；另一方面也接二连三地犯了一些路线性、政策性的错误，这其间有右的，也有“左”的，特别是“左”的危害性更大。白区的力量损失了百分之百，苏区的

力量损失了百分之九十，被迫进行长征。革命为什么一再遭受挫折？当时全党都在思考这个问题，都在找原因，也采取了措施。比如说，大家认为某一次错误是某一领导人造成的，就把这个领导人撤换了。可是换上一个领导人之后照样还是犯错误。虽然错误的形式每次都有所不同，有“左”的，有右的，有这一方面的，有那一方面的，有表现在政治路线上的，有表现在组织路线上的，有表现在军事路线上的，等等，具体形态千差万别。但是都是错误，都使我们的革命遭受挫折和失败。领导人一再更换，错误的形态也一再改变，而错误本身仍然存在，革命仍然遭到挫折，可见并没有找到犯错误的真实原因。经过很长时间，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一批同志才逐渐认识到这个问题枝枝节节地解决是解决不了的。毛主席非常明确地指出，要看到这些不同形式的错误，有一个共同的“根子”，是主观主义，就是主观和客观相分裂，认识和实践相脱离。而主观主义就是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要想从根本上解决党的路线问题，就必须把问题提到哲学的高度来观察，要看出这是一个辩证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形而上学的问题。只有对全党进行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教育，使绝大多数同志分清辩证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形而上学的界线，懂得我们制定和执行方针政策都只有遵循辩证唯物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才能取得成功，中国革命的航向才可能拨正，胜利才有希望。所以，毛主席在长征刚刚结束后就以极大的精力带头从事哲学研究工作。他在极困难的条件下想方设法搜集了一切可能搜集到的中外哲学书籍，在窑洞里，在油灯下刻苦钻研，作了大量的眉批和笔记，写出了《实践论》、《矛盾论》和其他重要的哲学著作，亲自给抗大的学生讲课。接

着他又亲自领导了以清算主观主义为中心内容的整风运动。这样就大大提高了全党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水平，使大家从世界观和方法论的高度分清了什么是正确路线，什么是错误路线，这才有了全党的空前团结和统一，才有了党的“七大”，才有了抗日战争的胜利和解放战争的胜利，才有了新中国。如果没有这样一场哲学斗争，不用马克思主义哲学武装全党的思想，会是什么局面呢？那就会永远弄不清正确路线和错误路线的区别，永远重复过去的错误，中国革命就不知道要在黑暗中徘徊多少年，五星红旗也不可能是1949年在天安门升起！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说中国革命的胜利也就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胜利。如果要讲效益，还有比这更大的效益吗？能说哲学是说空话的无用之物吗？

第二个例子是离我们今天的生活更近的，是1978年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这本来是一个古老的哲学问题，而且是马克思主义100多年以前就已经解决了的问题。可是在当时的具体情况下，却成为关系到国家命运的尖锐而迫切的问题，非重新“解决”一次不可。为什么呢？因为在十年动乱中林彪、

“四人帮”的破坏，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原理被歪曲得面目全非，成千成万的干部群众都不知道“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一条基本原理，是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毛泽东和其他马克思主义代表人物在他们的著作中反复论述过的原理。他们上了林彪、“四人帮”歪曲宣传的当，误认为毛泽东思想、甚至毛主席的语录是检验真理的标准。所以当粉碎“四人帮”后不久有人提出两个“凡是”的时期，许多人还看不出有什么问题，还以为这是符合马克思主义的。相反，当时有位同志发表了一篇题为“实践是检验

真理的唯一标准”的文章，却引起了许多人的抗议，说这是反毛泽东思想的大毒草，是妄图“砍旗”。那时人们的思想就混乱到了这种程度！可是，如果按照两个“凡是”的原则，凡是毛主席定下来的、讲过的，不管是对的还是错的都必须照办，凡是毛主席没有提过的、没有讲过的，哪怕是完全正确的也一点不能做，那我们的党和人民岂不是除了按照“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每隔七八年来一次“文化大革命”之外，什么事也不能做了吗？我们的国家岂不是还要在“文革”的灾难中一直活下去，直到被“开除球籍”吗？所以，真理的标准这个哲学问题确实成了关系到我国命运的大问题，正象民主革命时期“制定和执行政策应当从什么出发一是从实际出发，还是从经典著作的词句出发？成了关系革命失败的大问题一样。于是，在邓小平同志的领导和支持下，我国哲学界开展了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经过相当尖锐的争论，终于使理论工作者和广大干部群众从“凡是”的精神枷锁中解放了出来，这才有了十一届三中全会的胜利，才重新确立了实事求是的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才有了既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又改革开放搞活的国策，才有了今天这样举世瞩目的成就和无限光辉的前景。试想，如果我们当年不解决真理标准这个哲学问题，我们能在“文革”的框框里挪动一步吗？能有今天的一切吗？有些专讲“务实”的同志，讲起他们的经济工作的成绩来充满了自豪感，可以用许多具体数字来说明他们的效益，这是完全应该的。但是他们当中有的人看不起哲学，以傲慢的口吻嘲笑哲学的“无用”这就不对了。我们不妨提醒这些同志：如果不能解决真理标准问题，还按“语录标准”衡量一切，你今天做的这些事就

应该算是“资本主义复辟”，你还没有迈出第一步就该被打倒了，你能有什么成绩可以自豪？当然，今天我们全国各条战线上取得的成绩，是各种各样的因素共同起作用的结果，决不能说都是哲学单独起作用的结果（如果这样说，那又是哲学“万能”论的翻版，又是荒谬的夸大）。但是哲学的作用不能低估，更不能抹煞。从根本上看，如果当年不解决真理标准这个哲学问题，就不可能有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正确路线，就没有今天的一切。如果要讲效益，这个效益还不大吗？

以上两个例子还仅仅是指哲学功能的一个方面，还远不是它的全部。但仅仅两个例子就可说明，那种认为哲学没有用，没有效益的观点是肤浅的、片面的、不正确的。问题不在于哲学有没有用，而在于我们今天在深化改革、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样一个历史时期当中，究竟应该如何发挥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作用。现在强调务实的精神，这本身是完全正确的。我们再也不要重复过去那种空喊口号，不干实事的愚蠢作法。列宁在建设苏联的社会主义时一再强调，少发点政治的喧嚣，多做点实际的经济工作。这个观点对我们仍然适用。但务实仍然需要有一个正确的方向，而这个正确的方向，是由正确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决定的，离开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指导去片面地强调务实，就可能走偏方向，可能陷入爬行的经验主义，缺乏全局观点和战略眼光。在一些具体事务上我们可能干得不坏；但是从全局看，从长远看，从综合的效果看，可能就是在干糊涂事。这是不能忽视的。

马克思主义在当前和今后的改革中的作用具体地表现在



哪些方面？或者说，改革需要哲学在哪些方面为它服务呢？这是一个不容易回答得很全面的问题，人们的回答也未必一致。我只能按自己的理解试着谈一些看法。

第一，哲学要通过更新人们的观念，为深化改革开路。

历史上任何大的革命，大的社会变革，都是从观念的变革开始的。这是因为社会变革（无论是经济的还是政治的）总是通过人们的行动才能实现的。如果人们的旧观念不首先变革，不树立新观念，他们就不可能觉悟到认为有进行社会变革的必要，就没有兴趣、没有勇气去行动，而观念的变革是要靠先进分子去论证、去宣传的，主要的武器就是哲学。恩格斯在谈到1848年德国资产阶级革命的时候说过：“正象在十八世纪的法国一样，在十九世纪的德国，哲学革命也作了政治变革的导言。<sup>①</sup>”不仅法国、德国的革命是这样，美国革命、日本的明治维新、中国的戊戌变法和辛亥革命等等也都是这样。俄国十月革命和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也是从传播马克思主义、首先是从传播马克思主义哲学开始的。原因就在于任何时期人们的各种观念里最深层的东西是哲学观点，要变革人们的观念，就得抓住哲学这个最根本的东西。哲学对观念的更新起的作用是最深刻、最持久的。

我们今天进行的改革同上面说的那些革命改革在性质上当然很不相同，它并没有改变我们的国体和根本的经济制度。但是它也是一场非常深刻的革命。就一定的意义说，它甚至比过去的革命还要深刻。1949年取得胜利的那场革命是我们党领导人民奋斗了二十八年的结果，也是鸦片战争以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10页。